试论清顺战争

李鸿彬

The Qing - Shun War was a trial of strategic strength between Duoergun and Li Zicheng. Li Zicheng was defeated at Shanhaiguan and was forced to evacuate Beijing. Afterwards Li was defeated in Tongguan and was compelled to abandon Xi 'an. Finally Li was defeated at Jiujiang and killed at Jiugong mountain. The Qing - Shun War ended in victory for the Qing and the failure of Shun.

明朝末年，政治极端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明王朝的统治已步入了日薄西山的黄昏。当明王朝被推翻后，大清 、大顺以武力对阵，中原逐鹿，谁能取胜呢？古人云：“兵欲胜敌，谋贵素定，而战胜可必”。① 本文通过清顺战争，考察两军统帅多尔衮和李自成各自的谋略，集中表现在战略的制定及策略的应用两方面，从而析出清胜顺败的战争哲理。

一、闯王灭明和关城之战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以破竹之势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当时大顺占有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甘肃广大地区，拥有五十余万大军，形势大好，正处在一个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性变化时期。但这并不意味战争退居次要的地位，相反各支政治势力争夺天下的欲望和斗争更加激烈，因此军事战略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李自成在北京对关外正积极要进取中原的大清情况不明，对江南未曾遭农民军沉重打击，积怨又深的故明势力误认为传檄可定，所以没有能审时度势，制定一个知彼知己，力求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方针，虽然采取某些措施，却犯了严重错误，其中最突出的是“追赃助饷”。这种办法，一是面广，打击的对象包括故明“勋戚”、②“在京各官”、③“缙绅”、④“富商居民”，⑤甚至“满街遍捉士大夫拘系，行路之人如汤鸡在锅”，⑥人人自危；二是饷巨，“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⑦三是刑酷，“刑有炮烙，有脑箍者，有夹棍，有火尺，大抵夹者居多”。⑧当时用夹棍五千副，“有夹于（刘）宗敏处者，有夹于各营兵处官者，有夹于监押健儿处者，有夹于勋戚各官之家者，有夹于路次者，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施刑”。⑨仅刘宗敏一处，“极刑追逼，死者千余人”。⑩“追脏助饷”之策，首先给大顺战略上带来不利的影响，从过去积极进攻，转而消极退缩。四月十一日，李自成命将“盘鈫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一饼……凡数万饼”，⑪运回陕西，并说：“陕，吾父母国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岂易一西安乎？”⑫此言毫无战略远见，企图回陕西家乡过安乐的生活，于是导致官兵聚积金银，思乡厌战，有些“马厮、炊丁亦人怀重宝，皆有归志”。⑬其次就策略而言，李自成作为大顺开国之主，应以策略用人为先，何况自己身边谋臣无几，然而他入北京后的第五天，认为故明翰林富有，“凡翰林官无论新旧，皆派饷万金以上，诸人之多被刑拷，实由此也”。⑭随之在北京大肆“追赃助饷”，“拷掠”的腥风刮遍全城，一些读书明理，治国有方的谋士，有的惨死，有的自杀，有的复反，有的隐匿，有的外逃，有的降清，有的投明。大顺在京未能扩大社会基础，增强武装力量，确实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

李自成进京前，三月十五日在居庸关派遣新降的明定西伯唐通往山海关，招降明平西伯吴三桂，唐通“遗书三桂，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但是“三桂不答”。[15]李自成入京后，又命巡抚李甲、兵备道陈乙，“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16]吴三桂权衡得失，“忻然受命”，[17]决定归降大顺。他率领部众进京朝见李自成，山海关交给唐通等人驻守。四月五日，吴三桂行至永平西沙河驿，见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问及家中情况，“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18]“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19]又得知爱妾陈圆圆已为刘宗敏抢占，深感奇耻大辱，“乃大怒”，[20]“投袂起曰：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刘宗敏），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21]并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22]真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23]于是吴三桂“忿而中改”，[24]八日回军进攻山海关大顺军，“袭杀其守关兵殆尽，贼师负伤遁归”，[25]唐通败逃。吴三桂占领山海关后，下令斩“李甲头祭旗，割去陈乙两耳纵之”，[26]以示坚决与大顺为敌。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出齐化门直指山海关。吴三桂“见自成势大，难与争锋”，[27]许多部将也“以众寡不敌为虑，有进乞师策者”。[28]因此，他与谋士方献廷商量，问献廷“敌众我寡，计将安出？”献廷曰：“莫若请北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29]于是吴三桂命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为使臣，致书清摄政王多尔衮，请兵援助。

清崇德七年（1642）春，清太宗皇太极取得了松锦大战的胜利，明朝在关外精锐丧失已尽，再无力抵抗清军，他本想乘胜入关灭明，可是闻知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席卷中原大地，规模之大，威力之猛，都是空前的，于是企图联合农民军，消灭明王朝。十月十四日，皇太极特命贝勒阿巴泰、内大臣图格等人率军入关，观察动向，联络农民军，行前面谕：“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一二人，致与交恶。如彼欲遣使见朕，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达”。[30]然而阿巴泰此行未能如愿。第二年八月九日，皇太极病逝，其子年方六岁的福临继位，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二人共同辅助幼帝，实则多尔衮摄政，掌握军政大权。多尔衮足智多谋，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战略策略，他继承了其兄皇太极欲联合农民军，消灭明王朝，建立全国政权的战略方针。顺治元年（1644）一月二十七日，派遣迟起龙、缪尚义等人为使者，以顺治帝的名义给大顺农民军将领致书，书曰：“朕与公军，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勿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31]此书送到大顺军镇守榆林的将领王良智手里时，李自成已率军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了，当李自成得到王良智的报告，未能从战略的角度，派人携书前往关外，探明大清虚实，采取对策，并对清“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建议不予理睬，此乃策略上的一大失误，从而促使清由联合转为敌对的战略策略的变化。

多尔衮伫待多日，未见农民军一字回音，心中已有所思。四月四日，清的重要谋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向多尔衮启奏，建议改变联合农民军，消灭明王朝的战略方针，认为现在清的主要敌人不是明王朝，而是农民军，奏曰：“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32]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战略上由联合农民军灭明，转而以农民军为敌，于是九日，他率领八旗大军向关内进发，行至辽河，得知李自成的大顺军已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王朝被推翻，此时多尔衮征求熟知关内和农民军情况的洪承畴意见，洪承畴向多尔衮奏称：“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流寇）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傥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

更易……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33]多尔衮见后受到很大鼓舞，决定由内蒙入关，攻打北京。

四月十五日，多尔衮师抵翁后（辽宁阜新境内），遇见吴三桂派遣的使臣杨珅、郭云龙。他们献上吴三桂向多尔衮求援书，书曰：“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之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关等处）西协（即墙子岭、密云等处），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34]多尔衮认为吴三桂请兵求援，入关攻打农民军，夺取北京城，这是符合清战略方针的，并和此次出征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大喜许诺”。[35]但是，明朝已经灭亡，吴三桂来书未降清称臣，却以明朝官员的身份称清为北国，“泣血求助”是向清借兵，极为不满。所以十六日，多尔衮给吴三桂复书，虽同意出兵援助，但要他降清，书曰：“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36]

二十一日晨，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到达山海关，在石河两岸与吴三桂军对阵，并命唐通率领一支人马，从九门口“北出而东守外城，以困截之”，[37]采取关内外夹击战术。初战吴军大败，退入关城，陷入大顺军的包围之中。多尔衮对吴三桂胸怀戒心，未从中协西协进关，而从义州（辽宁义县）南下，日夜兼程，是日下午抵达关门外十五里处的欢喜岭停兵不前，“高张旗帜，休息士卒，遣使往三桂营觇之”。[38]这时得到“吴三桂哨骑来报，贼已出边立营”。[39]多尔衮派兵进击，唐通战败，退入长城内。大顺军攻打关城，吴三桂度势不支，急待清军速援，“三桂复遣使往请，九王（多尔衮）犹未信，请之者三，九王始信，而兵犹未即行”，[40]显然是多尔衮对吴三桂施加压力，迫使他投降。吴三桂心急如焚，“遣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41]二十二日早晨，多尔衮移师至关城镇东门外二里的威远堡，“三桂知清兵已在关外，遂突围出外城，驰入清壁中见九王，称臣，遂髡其首，以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歃血斩衣，折箭为誓”。[42]此时得到探报，北翼城部分吴兵哗变，投奔大顺军，多尔衮命吴三桂先行，并说：“尔回可令尔兵各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43]吴三桂回城后，在关门上竖白旗，他“率诸将十数员，甲数百骑出城迎降，九王受拜礼于阵中，进兵城中”。[44]英郡王阿济格等率左翼入北水门，豫郡王多铎等率右翼入南水门，清军皆秘密入城，隐蔽在关城之下。多尔衮对大顺军高度警惕，告诫众将“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大顺军）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可成”。[45]他胸有成竹，乘敌无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命吴三桂为先锋，以吸引大顺军主力。

这时李自成不知道清军已到达山海关，准备参战。他认为关城易守难攻，便把攻城的大顺军撤到石河两岸，自北山横亘至海一字摆开，作战时可以首尾相顾，诱吴三桂出城来战，可一举歼灭。那知多尔衮暗中观阵，知其意图，采取相应的破阵对策，他说：“我兵可向海对贼阵尾，鳞次布列，吴三桂兵，分列右翼之末”。[46]随后吴三桂率军首先出战，他心中明白，此战只能胜不能败，故以死求生，与大顺军战于龙王庙和谭家颇罗地区，战斗非常激烈。据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自成、宗敏知边兵劲，成败决一战，驱众死斗。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兵左右奋击，杀贼数千。贼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兵寡，三面围之……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47]可见，吴三桂已陷入重围，面临溃败的危险。多尔衮在顺吴两军“战初合，满兵蓄锐不发，苦战至日昧，三桂军几不支”，[48]此刻他看到突击大顺军的时机已到，立即命阿济格、多铎等统领两白旗，“以二万骑，自三桂阵右突入，腾跃摧陷”。[49]战局立刻发生了变化，大顺军陷于清军和吴兵的包围与夹击之中，战斗非常残酷，“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骑贼之奔北者追逐二十里至城东海口，

尽为斩杀之，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几矣”。[50]

当时李自成骑马按辔立于高岗点将台指挥战斗，突然“见白旗一军，绕出三桂右，万马奔腾，不可止”，不知从天而降的白旗军为何兵，“自成麾后军益进”，[51]准备火速驰援。他身边有一僧人曰：“此非吴兵，必东兵也，宜急避之”。[52]李自成听说白旗军是清军，十分畏惧，便弃军策马而走。大顺军“见白标（旗）军，如风发潮涌，所到之处无不披靡，于是贼遁”。[53]仍有一部分大顺军坚持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在红瓦店为清军所败，勇冠三军的刘宗敏，“亦中流矢，负重伤而回”。[54]

大顺军战败后，向北京溃退，清军尾随追击。李自成没有调兵增援，组织反攻，二十五日，却“先遣人入京，令礼政府榜示各官，速备登极仪物”，[55]“毋致临期失误”。[56]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到北京，对丞相牛金星说：“北兵势大，城中人心未定，我兵岂可久屯在此？即十北京，不致一秦中险固，为今之策，不若退处关西，以图坚守”。[57]因此，二十九日，他在武英殿仓促登极称帝，三十日凌晨，便率部离京西走。

山海关之战，以清胜顺败而告终。这战对清来说，可谓“定鼎燕都，一统之基实始于石河一战”，[58]自此“期年之间南北浑一”。[59]对大顺而言，则一蹶不振，由胜转衰，开始走上失败的道路。

二、清的战略和攻克西安

顺治元年（1644）五月二日，多尔衮率领清军进入北京，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清朝，大顺、大西和南明三种政治势力鼎足的局面，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异常尖锐。多尔衮面对新形势，为了战胜对手，统一全国，首要任务是巩固京畿，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 吊民伐罪。多尔衮多次向关内官民谕示，过去明清虽为敌国，如今明朝已被大顺推翻，崇祯帝饮恨自杀，“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雠，出尔水火”，[60]“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反辙”。[61]他化敌为友，以大顺为敌，争取故明的官民拥护。

2. 追击闯王。四月三十日，多尔衮师次公罗店，得知大顺军弃京西撤，即命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和吴三桂等人，率军“兼程追贼，勿入京”。[62]大顺军一败保定，二败庆都，三败定州北清水铺，沿途几员大将被杀，数万士卒逃亡。五月四日，李自成至真定，他“耻于累败，贼党渐携，忿之，自勒精骑还击三桂，关兵、清翼张以进，杀大将三人，斩万余级，自成大败走”。次日，李自成合兵复战，“贼殊死斗，三桂益奋，贼渐却，关兵射自成中之，坠马走还营，创甚”。[63]于是拔营西走，经井陉，度故关，入山西。十二日，清军进抵故关，停止追击，返回北京，大顺军遭到沉重打击，使其无力北上反攻。

3. 严明军纪。多尔衮在入关当天，就告诫清军官兵曰：“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64]因此，“满兵入京，法令甚严，俱驻城上，附近居民有馈酒食者，皆不敢受”，[65]“却于道旁埋锅而爨，无辄入民家者，民或往观，弗之禁”。[66]“所食物，黑碎而干，以少水吞之，便度一日”。[67]这种良好军纪，颇得民心。

4. 安抚明臣。五月三日，多尔衮宣布明朝“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薙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68]四日，多尔衮令臣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他说：“予与明朝虽为敌，殊切痛惋，特令举国挂孝三日，以尽君父之情，仍令太常、礼部等衙门，尊以天子之礼，葬于原拟之圹”。“于是各官奉令，自初六日始，设先帝后位于帝王庙，合京臣民哭临三日”。[69]这就消除许多故明官员的疑虑，纷纷归降，甚至已经南奔的又返回北京降清。

5. 镇压反抗。当时三河县、昌平州、红西口及天津等地农民发动反清斗争。五月五日，多尔衮令三河“县官加意防辑”，并晓谕抗清农民“各安生业”。[70]六日，命固山额真巴颜、石廷柱等率军前往昌平州进行讨伐。十日，遣固山额真李国翰、刘之源统兵征剿红西口。十二日，派固山额真金砺、梅勒章京李率泰前去“安抚天津等处乱民”。[71]这些地区的抗清斗争，很快被平息。

多尔衮推行的这些政策和措施，虽然有不

足之处，但是稳定了京畿。他在此基础上，以图进取，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早日击败敌对势力，作出了迁都北京的重要决策。六月十一日，多尔衮向在沈阳的顺治帝奏曰："臣再三思维，燕京势踞中原，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若皇上不蒙天畀，则有失天下之民，伏祈皇上熟虑"。[72]顺治帝同意迁都北京，战略目的是"以定天下"。二十日，顺天府等处监察御史柳寅东，"为陈定国大计事，启曰：今贼西遁，已近两个月，征守如何定之，尚不得知。虽有深谋妙计，暂不晓谕民人，然李自成一日不除，国仇一日不得报，本朝亦不得安宁。今贼正秣马厉兵，而我却不睬之。窃思：如贼入秦，挟制民众，死守黄河，则恐我军不易破之。贼若与我对阵，即可守秦地，若不能对阵，势必退入西蜀地方，彼时则进讨更难。时已届秋，庙堂宜定大计……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欲图西贼，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收晋豫，约定内应，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73]这份启奏，适时而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任务和应采取的战略。多尔衮很赞同，接受柳寅东的建议，制定了先西北矛指三秦，攻打大顺，后东南饮马长江，讨伐南明，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于是他派兵进入山西、河南剿抚，以削弱大顺的外围力量，并且致书警告南明，勿忘清为明"雪耻"之恩，将"遣将西征……报乃君国之仇"，[74]以阻止南明乘机北上进犯。

李自成在真定战斗中，被箭射中"胁下"，"深入三寸，箭杆拔出，镞头入骨，再三镢出，血流不止"，[75]人昏迷不醒。因此，大顺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权斗争，"大将刘宗敏，丞相牛金星私幸闯必夭亡，皆蓄争立之志"。[76]三天后，李自成苏醒过来了，可是又得急报，"河南归德府同知陈奇，商丘令贾士俊，定陵令许承荫，唐邑令孙淦，考城令范隽，拓城令郭经邦及尚国俊七人，俱被兵部尚书丁启睿命参将丁启光擒缚往南京"，[77]"河南州县多反正"。[78]他大惊失色，抱伤"召诸将议"，[79]研讨对策，当时李岩将军"请分兵二万，收复河南各郡县，闯未及允……是晚闯密请（牛）金星议曰：李岩亦枭雄姿，向以势穷归我，今得兵而去，恐他日得志，则难制服矣，太师以为何如？"[80]牛金星"忌李岩、李牟（李岩弟）得军民心"，[81]早已怀恨在心，"见闯疑岩，遂乘机对曰：河南为三秦门户，晋楚屏藩，古来帝王建都之地，且属李岩故乡，若以大兵与之，定纵虎归山而添之翼矣。他日若举中州之豪杰，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则彼此事势又有不可知者矣，断然不可"。[82]于是李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83]次日，牛金星"以自成命，邀岩饮，伏壮士于幕，三爵后，并其弟牟斩之"。[84]军师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无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85]"自此文武不和，军士解体，自成遂以不振"。[86]可见这场内部残杀的悲剧，给大顺政权带来重大损失。途中太谷、榆次、定襄等地的故明官绅富商起兵反抗。六月初，李自成行至平阳（山西临汾），"分兵于山西诸隘"，[87]以制将军张天琳守晋北大同地区，文水伯陈永福守晋中太原地区，平南伯刘忠守晋东南长治地区。然后他率部南下经闻喜，向西渡黄河抵韩城。七月上旬回到西安。

李自成败回西安后，根据当时面临的形势，制定了以关中为抗清基地，东出潼关，北渡黄河、南征汉中，伺机北伐的战略方针，主攻目标是清，所谓"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88]随之命高一功、李过等驻守陕北，并领兵进攻晋北州县，又"发兵出潼关，下河南"，[89]收复失地，进逼河北，而且大顺军出固关，占领井陉，后被清军击退。

与此同时，多尔衮派遣归降的故明诸生吴惟华去山西大同，招降了明总兵姜瓖，随后又向他敕谕："三晋地方，乃京城之右翼也，由此至西秦地方，皆被贼蹂躏，致使民不聊生，著尔速往传谕，乘机安定之"，[90]于是接着晋北的代州、繁峙、崞县等地，也被招抚降清了。另外，多尔衮命令固山额真叶臣率军平定山西，"由饶阳至怀庆，附近郡邑悉下"，[91]"土贼悉已平定"。[92]然后多尔衮为了增强平定山西的兵力，遣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等，率军会叶臣，共同行事。接着又派前锋统领席特库，率将士往助平定山西的叶臣军。他们将所占领的怀庆、潞安、泽州三府所属州县，"俱已委员管理"。[93]

大顺军将领、原明定西伯唐通自山海关战败后，随李自成西撤，与大顺军亳侯李过驻守

府谷。他“见贼势蹙不足恃，力纠集散卒，击走贼将李过，还驻保德州”。[94]九月十五日，唐通降清，便引清军攻陷李自成故里米脂县。此时李自成因李过“府谷折兵太多，绑回长安”，随后李过被释，“又添复来，一路府谷，一路保德”，[95]企图深入晋北地区，但被清军击败，退回陕北。

叶臣夺取怀、潞、泽三府后，于九月十三日率领清军出故关，直逼山西重镇太原府城。大顺军驻守太原的将领陈有福，采取凭坚城重炮，坚壁清野的战术。叶臣领兵进抵太原城下，“派员招降，然贼不从”。[96]十月三日，清军攻打太原城，据从征的吴惟华塘报：“臣督率官兵，擐甲城北，仗红夷神力，攻破北面间，随据臣标总兵张致雍、补国忠、张凤鸣、中军副总兵贾廷谏、监军道游击张台等报称：奉本军门并诸固山号令，马步分进，攻击迭施。如攻城，则遣都司金梁等七员、步兵七百名，填壕二道，协助大兵过壕安梯，攻破太原北面矣；如截杀，则遣参游都守叶如兰等三十二员，马兵九百余名，在太原城东南一带埋伏，本日贼果奔溃出城，伏兵四起，当阵杀死逆贼一千有余”。[97]陈有福弃城逃走，不久降清。叶臣攻占太原后，“府属五州二十县归降”。[98]七日，他乘胜率军南下，进攻汾州、平阳二府，大顺军“弃城遁走，山西全省悉平”。[99]

多尔衮进入北京后，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不仅巩固了京畿，而且占领了山西、山东、河南省的许多府州县。十月一日，顺治帝在北京行定鼎登基，正式宣布清的战略是“早靖祸乱，载戢干戈，九州悉平”，[100]完成全国统一的历史任务。多尔衮根据原已 制定的先西北、后东南的战略方针，把征讨大顺放在首位。当时河南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顺军乘叶臣率军攻打太原，河南兵弱之机，于十二日，从山西垣曲东进攻济源。十三日，清卫辉总兵祖可法率军到怀庆，当天与怀庆总兵金玉和统兵前往济源求援，大顺军已攻占济源，两军激战中，金玉和在柏乡镇西中箭身亡，祖可法回军途中遭伏击，将兵退入怀庆。十五日，清河南巡抚罗绣锦向多尔衮启奏求援，启曰：“贼势猖獗，逼近怀城仅三十里，以及孟县城下。贼之狡谋，其意不止在怀属，而意欲占据河口。况大河以南，尚有贼氛，万一通联，势所难图……伏乞亟敕兵部，速催大兵星夜兼程前来，以济救援”。[101]接着孟县失守，怀庆被围。二十二日，李自成为了增强大顺军的兵力，“图河南诸郡”[102]，“遣兵出潼关，分八营，三营趋归德，三营趋裕州，二营据郏县”。[103]多尔衮见以上情况，决定派兵入陕与大顺军会战。十九日，授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军征讨大顺，命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领所部从征，由晋北渡黄河入陕西，进攻西安。二十五日，授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南下，命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领所部从征。这支清军，实有两图，首先征讨大顺，然后进剿南明。早在三天前，清廷就遣学士詹霸驰赴阿济格军传谕曰：“顷闻流寇急攻怀庆，已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于是月二十五日率师南下，便道往征。豫亲王如已克流寇，即遵谕仍赴南京，如流寇闻风遁走，豫亲王即追蹑贼后，直趋西安。豫亲王先至西安，则勒兵以待尔等。尔等先至，亦宜待豫亲王。两路大师务期合力攻剿，平定贼寇，勿以先至彼地，遂不相待”。[104]由上可见，多尔衮采取东、北两路夹击会攻西安，企图一举击溃大顺政权。

李自成北伐征清的战略受挫，面临清大军压境。十二月初，他“闻英王将南下，惧弗支，则调关中兵，悉往应之，”[105]而且亲自率领大军“北趋延安逆战”，[106]行至洛川，得报西安东大门潼关军情紧急，清军将攻关而入，于是回军救援。当多铎率军前往怀庆，大顺军自动撤围，退到河南。十二月一日，多铎命护军统领图赖先率精兵从孟津渡河，大顺军都司黄士欣、果毅将军张有声“各遁去，沿河十五寨堡兵民，俱望风归附”。十四日，多铎至孟津渡河，“大军俱向潼关进发”。[107]十五日，清军至陕州，又击败大顺军张有鲁部于灵宝。二十二日，清军距潼关二十里立营，固守不战，俟红衣炮军到来。

潼关是著名的关隘，易守难攻。此时李自成率援军来到潼关，二十九日，刘宗敏“据山为阵”，以拒清军，被击败。顺治二年（1645）正月初四，刘方亮率军进攻清营，又被击败。李自成闻讯，“亲率马步兵拒战”，再次被清军击败。五、六两日，大顺军又连续发动进攻，皆为清军战败。九日，清军攻坚的红衣炮运到。十一日，多铎命红衣炮军进逼潼关口，于

是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加强防御，阻止清军入关。清军“举红衣炮攻之”，在火炮掩护下，大举进攻，所向披靡，李自成见大势已去，率领部分大顺军撤回西安。十二日，清军“渡潼关壕口”，大顺军“望风奔溃”，[108]驻守潼关的巫山伯马世尧率部众降清。十三日，清军入潼关，是日马世尧诈降泄露被杀。

李自成败回西安，未能立即调集各路人马组织会战，与清军决一死战，却“欲返据延安”。[109]可是上年十一月，英亲王阿济格统军至宁武关，唐通前来迎谒，“王令往保德州河岸，造筏济大军”。[110]阿济格因至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等地索取驼马，于是十二月中旬，直接从边外入陕西，而征调山西汾州、应州、朔州三处兵马，俱从保德渡河，至二十日俱已过尽。[111]阿济格汇合两军南下，直趋西安，大顺军将领高一功、李过等，虽顽强抵抗，但仍不敌清军，榆林、米脂、绥德等府州县相继失守。当多铎攻占潼关，阿济格正围攻延安，李自成见清军两路夹攻，认为西安已不可守，便于顺治二年（1645）正月十三日撤离西安、至蓝田下陕南。此次大顺潼关战败，弃西安南走，实则重蹈山海关战败，弃北京西走的覆辙，就战略而言，无疑走上了失败的道路。

三、转战豫鄂赣和大顺败亡

多铎得探报李自成已率部弃西安南走，一月十六日，他领大军自潼关起行，十八日，不费一兵一卒进占西安，此时由陕北南下的阿济格部，“未及入长安四百里余”。[112]多铎见李自成率领十几万大军南进，主力依存，另外自己还身负进攻南京的战略任务，他怕李自成抢先攻占南京，消灭南明弘光政权，据江南富庶地区反清，于是不待与阿济格部会集，便命部分汉军驻守西安，亲领大军追击李自成的大顺军。二月八日，清廷根据陕西的战况，分别谕多铎、阿济格两军统帅，谕多铎曰：“闻尔等破流寇于潼关，遂得西安，不胜嘉悦。初曾谕尔等往取南京，今既攻流寇，大业已成，可将彼处事宜交与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等，相机即遵前命，趋往南京，大丈夫为国建功，正在此时，汝其勉之”。[113]可见清廷表彰了多铎的功绩，并命他“往取南京”，“为国建功”，追击李自成大顺军的任务交给阿济格。同日又谕阿济格曰：“尔等自京起行在先，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等起行在后，今豫亲王等已至潼关，攻破流寇，克取西安，尔等之兵，未知尚在何处，此皆由尔等枉道越境……以致逗留故也。今已命豫亲王恪遵前旨，往定南京，尔等可仍遵前旨，将流寇余孽，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留之咎，勿以流寇已遁，西安既平，不行殄灭，遽尔班师”。[114]清廷指责阿济格，进军缓慢，延误战机，未能与多铎合力消灭大顺，因此命他追歼李自成的大顺军，“以赎从前逗留之咎”。十四日，多铎领兵追击李自成抵河南，“旋得平定江南之谕，即于三月初五，率师南征”。[115]二月阿济格抵西安看到上谕后，原先大顺军驻守陕北抵抗北路清军的李过、高一功部，因见李自成已撤离西安，便率部众入汉中，沿川边南逃，而且与闯王相距较远，一时不可能汇合，于是迅速集中兵力，率领清军急驰追击李自成部。

李自成未能凭借大顺军陕西家乡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击溃清军的两路进攻，反而成了战败者，率领部众撤弃根据地，匆匆南奔。在这个重要时刻，他又没有提出如何转败为胜，鼓舞士气新的战略方针，致使大顺官兵作战目标不明，对前途丧失信心，甚至有些意志不坚的人，离队出走，或叛变降清，尤其是原已归降，分散在各地的故明文官武将，见形势不妙，纷纷叛离。当时最为突出的是陕南大顺军护军将军贺珍率部降清，使形势变得更为险恶。李自成弃西安后，率领大顺军主力部队途经蓝田、商州、龙驹寨（丹凤），出武关入河南，经内乡、南阳、邓州，转入湖北，沿汉江而下，经襄阳，二月二十五日至承天（钟祥），三月初走汉阳、沔阳、德安，向武昌进发。当时南明驻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告急”，[116]三月二十五日他“请除君侧之恶，移檄远近，以讨马士英”，[117]统帅全军沿江东下，四月四日在九江病死，由其子左梦庚统其众，连陷湖口、彭泽、建德、东流、安庆等地，南京戒严。

三月底，李自成“至武昌，左良玉已率众东下，城虚无人”，于是率领大顺军浩浩荡荡进入武昌城。他立即整编部队，将“数十万”大顺军，“分为四十八部”。同时他说：“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提出“谋夺舟南下，取宣、歙”，[118]“规取南京”[119]的战略方针。这个

战略方针并非上策，一是清豫亲王多铎奉旨率军，经河南、安徽，已先进入东南，兵临扬州城下，南京的弘光小朝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很快就要灭亡；二是大顺军沿江东下，前有南明左梦庚部阻截，后有清阿济格尾随追击，陷入前后夹击之中，可是李自成对面临的问题并不重视，更未制定相应的对策，大顺军必将受挫。

李自成进入武昌不久，阿济格率军“蹑其后，至武昌”，[120]命“纛章京哈宁噶将兵围武昌城数匝”。[121]李自成见武昌陷入重围，便遣“刘侯（刘宗敏）、田侯（田见秀）引兵五千人，出城迎敌”，[122]清将“路什同前锋苏拜击败其众，并俘获自成妻孥”。[123]四月二十四日，李自成因大顺军战败，决定放弃武昌，率全师顺江而下。阿济格率军在后面紧追不舍，四月底大顺军又被清军“蹑击之富池口，获其船，贼党整众据河岸拒，兴鼐同护军统领哈宁阿、参领希尔根击溃其众”，[124]“直逼自成庐帐，自成……潜越富池口而遁”，清军俘“总兵、知府、推官各一人，知县四人，守备、把总五人，获马匹船舰无算”。[125]李自成率领大军继续东进，阿济格命谭泰率大师乘舟追之，大顺军到达距九江约四十里处，清军追踪而至，两军对阵，展开激烈的搏斗，大顺军大败，清军攻入老营，据阿济格疏报：“俘自成两叔伪赵侯、伪襄南侯、并自成妻妾二口，获金印一颗。又获伪汝侯刘宗闵，并一妻二媳，自成养子伪义侯姜耐妻，伪齐侯顾英妻，伪总兵左光先，并一妻三子，及术士伪军师宋矮子（宋献策）。又获太原府故明晋王二妃。其自成两叔，及伪汝侯刘宗闵，俱斩于军。自成又有妻妾三口，因我兵追急，投扬子江死”。[126]随后宋献策、左光先降清，丞相牛金星乘机叛逃了。[127]五月初，左梦庚“率总兵十二员，马步兵十万，并家口，泊舟于九江之东流县界扬子江中投降，共带大小船只四万”，[128]于是清军实力大增。

李自成从西安退却后，这对大顺军广大官兵而言，深感失去了尊严和荣誉，但退却不是说就不反击，只有反击取胜，方能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何况大顺军有二十余万人马，在数量上大大多于尾随追击的清军，再则沿途的襄阳、承天、荆州、德安四府又是大顺军原驻守设防地区，既有驻军，又熟悉地形，是反击的好地方。当大顺军退却到德安时，镇守该地的将领白旺，向李自成建议，加强防守，进行反击，可是闯王不采纳，却强令他率部随军退却。[129]李自成一路上闻清军追来，便率部而走，或遭清军攻击，战败而撤，这种一退再退，不组织有效的反击，在战术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部队人心浮动，士气涣散，遇战必败的后果。

大顺军在富池口、九江之战中遭到惨败，损失严重，李自成认为东进“欲取南京”的战略方针已无力实现了，因此决定回军，由江西经湖北入湖南，开辟新的反清基地。五月，他行至湖北通山县境，被地方乡勇杀害，据费密的《荒书》记载：“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130]李自成在退却转移途中，一时疏忽大意，不幸牺牲，致使大顺政权灭亡。

阿济格追击李自成取得很大战果，闰六月四日，他向清廷报告说：“蹑其后，追及于邓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等七处，降者抚之，拒者诛之，穷追至贼老营，大败贼兵八次，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公山。……计我兵追蹑自成，及分翼出师败贼，凡十有三战，获驼三十一，马赢六千四百五十，船三千一百八艘……合计河南属城十二、湖广属城三十九、江西属城六、南京属城六，共六十三城，已尽设官抚定”。[131]十日，清廷“以流贼荡平，遣侍卫坤巴图鲁赍书往谕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等曰：顷者览王奏捷，知王与诸将同心奋勇，扫灭逆寇，克奏肤勋，不胜喜悦。念王及行间将士，驱驰跋涉，悬崖峻岭，深江大河，万有余里，亦可谓劳苦而功高矣，今寇氛既靖，宜即班师”。[132]清顺战争，清的最高决策者多尔衮，“授阃外之略，一败于关门，而神器归；再破于西安，而巢穴扫；三灭于九江，而根株净”，[133]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最后以清胜顺败宣告结束，达到了战争的目的，为实现进取中原，完成清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

①《删定武库益智录》卷 7，谋猷篇。

②③④⑦⑨⑭㊼㊽《甲申核真略》。

⑤⑥⑩计六奇：《明季北略》卷 20，廿五癸丑拷夹百官。
⑧懒道人：《李闯小史 》第 3 卷。
⑪⑫㊼(51)彭孙贻：《流寇志》卷 12。
⑬《甲申纪事》。
⑮彭孙贻：《流寇志》卷 11。
⑯⑳㉖㉙抱阳生：《甲申朝事八纪》卷 5，吴三桂始末。
⑰钱粤只：《甲申传信录 》卷 8，吴三桂入关之由。
⑱钱粤只：《甲申传信录 》卷 8，借兵复仇。
⑲张怡：《谀闻续笔》卷 1。
㉑《吴三桂纪略》。
㉒㉘㉟㊽刘健：《庭闻录》卷 1。
㉓吴梅村：《圆圆曲》。
㉔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
㉕《吴耿尚孔四王全传》平西王吴三桂。
㉗㊳㊵㊶㊷计六奇：《明季北略》卷 20，吴三桂请兵始末。
㉚《清太宗实录》卷 63，崇德七年十月壬子。
㉛《明清史料》丙编第 1 本，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㉜《清世祖实录》卷 4，顺治元年四月辛酉。
㉝《清世祖实录》卷 4，顺治元年四月庚午。
㉞《清世祖实录》卷 4，顺治元年四月壬申。
㊱《清世祖实录》卷 4，顺治元年四月癸酉。
㊲叶梦珠：《阅世编》卷 10，纪闻。
㊴《清世祖实录》卷 4，顺治元年四月戊寅。
㊸㊺㊻(64)《清世祖实录》卷 4，顺治元年四月己卯。
㊹㊿《沈馆录》卷 7。
㊾《清史稿》卷 474，吴三桂传。
(52)(54)冯梦龙：《燕都日记》。
(55)(61)(63)谈迁：《国榷》卷 101。
(5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 20，附记野史。
(58)乾隆《临榆县志》原序。
(59)沈天植：《山海关志》序。
(60)《清世祖实录》卷 5，顺治元年五月戊戌。
(62)魏源：《圣武记》卷 1，开国龙兴记四。
(65)(67)(69)李天根：《爝火录》卷 3。
(66)刘尚友：《定思小纪》。
(68)《清世祖实录》卷 5，顺治元年五月庚寅。
(70)(71)《清世祖实录》卷 5，顺治元年五月壬辰。
(72)(73)(96)(98)(10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第 27，43，54，55，50 页。
(74)《清世祖实录》卷 6，顺治元年七月壬子。
(75)(76)(80)(82)懒道人：《李闯小史》第 10 卷。
(77)(81)(8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 23，李自成死罗公山。
(78)(83)(84)(86)(87)李天根：《爝火录》卷 4。
(79)《明史》卷 309，流贼传李自成。
(88)《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 458 页。
(89)(102)彭孙贻：《流寇志》卷 13。
(9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第 34 页。
(91)《清史列传》卷 4，叶臣传。
(92)《清世祖实录》卷 5，顺治元年六月壬午。
(93)《清世祖实录》卷 8，顺治元年九月乙巳。
(94)(110)《清史列传》卷 79，唐通传。
(95)《明清史料》丙编，第 5 本，山西总兵高勋揭帖。
(97)《清代农民战争资料选编》第 1 册上，农民军失守太原。
(99)《清世祖实录》卷 11，顺治元年十一月戊戌。
(101)《清代农民战争资料选编》第 1 册上，农民军在河南济源孟县驻扎情形。
(103)谈迁：《国榷》卷 103。
(104)《清世祖实录》卷 10，顺治元年十月丙子。
(105)郑廉：《豫变纪略》卷 7。
(106)《白水县志》卷 1。
(107)《清世祖实录》卷 12，顺治元年十二月戊辰。
(108)《清世祖实录》卷 14，顺治二年二月乙酉。
(109)李天根 ：《爝火录》卷 8。
(111)《清代农民战争史料资选编》第 1 册上，清军招抚木瓜园等堡并筹济粮饷。
(11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745 页。
(113)(114)《清世祖实录》卷 14，顺治二年二月辛酉。
(115)《清世祖实录》卷 15，顺治二年三月丙申。
(116)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 9。
(117)计六奇：《明季南略》卷 3，又檄。
(118)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 10。
(119)《清史稿》卷 217，阿济格传。
(120)(123)《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卷 344，路什传。
(121)(122)(125)张玉书：《张文贞公集》卷 7，纪灭闯献二贼事。
(124)《满洲名臣传》卷 15，兴鼐列传。
(126)(131)《清世祖实录》卷 18，顺治二年闰六月甲申。
(127)参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 206 页，注(65)(66)。
(128)《八旗通志初集》卷 140，阿济格传。
(129)参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 289 页。
(130)费密：《荒书》。
(132)《清世祖实录》卷 18，顺治二年闰六月庚寅。
(133)《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 1 册上，李自成等牺牲后降清之汉族官僚称贺于清廷。

（李鸿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邮编：100872）